

云冈石窟研究

阎文儒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Y YUNGANGSHIKU
YANJIU

2879.224/1

云冈石窟



研究

阎文儒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冈石窟研究/阎文儒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6

ISBN7 - 5633 - 3939 - 6

I . 云… II . 阎… III . 云冈石窟 - 研究
IV . K879 . 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365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高唐县福源路 90 号 邮政编码:252800)

开本: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21.75 字数:300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6 000 定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为祖国的考古 事业增辉

——追忆先父阎文儒教授

阎万石 阎万钧

先父阎文儒(1912~1994),字述祖,又名成凡,辽宁省义县人。他自幼酷爱读书,二十岁投考东北大学,在数百名考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一。一九三六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向达教授。在三年的学习中,他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写出了长达二十余万字的《西域文明史》,受到向达教授的高度评价。一九四一年,先父到西安调查长安城,并用了两年的时间写出了《西京胜迹考》一书,这是先父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

一九四三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向达教授任“考古组”组长,夏鼐任副组长,先父为组员。“考古组”于四月到达敦煌鸣沙山发掘唐墓,暑期至莫高窟考察,积累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秋后,继续发掘唐墓,并详细调查了阳关、玉门关、汉长城、安西榆林窟和唐代的玉门关等,年底返回西安。一九四四年,先父又与夏鼐先生至酒泉、张掖、武威等地,调查了张掖南山下的石窟,还在民勤县发掘沙井子新石器时代遗址。此次河西考古,正值抗日战争艰难时期,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探访祖国的文化宝藏,为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九五六年,为了纪念释迦牟尼诞辰两千五百周年,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对房山石经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先父和原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黄炳章先生等参加了这一举世瞩目的考古工作。他们清理了雷音

洞,打开了另外八座封存多年的藏经洞,共取出四千余块隋唐时代刻的经板。一九五七年夏,先父和黄炳章等人根据一座辽碑的记载,在已毁坏的南塔周围挖掘,在塔南发现了深五米,埋藏六层经碑的地穴。他们按照经碑排列顺序编号,再抬出拓印。经清点,有一万余块,比碑铭上的记载多出一倍以上。经后来考证,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契丹藏》。先父在将近两年的房山石经考古发掘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许多报刊对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作了报道。

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期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先父投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历代诸馆的布置陈列工作中。他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半个多月才回家一次。国庆前夕,周恩来总理来到历史博物馆视察工作,当他看到康熙和乾隆的画像时问:“你们从这两幅画像里能看出康熙和乾隆有什么区别?”先父回答道:“康熙重武功,乾隆偏文治。”总理指了指两幅画像说:“你看,康熙的画像侧面有书架,架上整齐地排列着许多书,乾隆画像侧面也有书架,架上放的却都是古代瓷器。可见康熙励精图治,乾隆贪图享乐。这才是他们的区别。”

二

先父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贡献,莫过于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研究和总结。

从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先父接受锡兰国(现斯里兰卡)的邀请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了编写《佛教百科全书》中的“中国石窟”部分,率全国石窟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行程三万余里,先后三次对全国的石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第一次调查从一九六一年六月开始,调查了新疆各石窟(包括拜城克孜尔石窟、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和克子里喀拉罕石窟及库木吐拉石窟群、焉耆七格星明屋石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等),甘肃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四川广元皇泽寺石窟、大足龙岗山石窟,浙江杭州飞来峰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大同云凤石窟,等等。此次调查历时一年半,弄清了不少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对过去

根本不被人们注意的石窟进行了分期、编号、造册、登记,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料。一九六三年以后,先父又率调查组两次前往甘肃炳灵寺石窟、陕西庆阳寺沟北石窟、郴州大佛寺石窟等地进行了调查,这是对第一次调查的进一步核实和补充。可以说,调查组对全国石窟寺的三次调查,是我国现代考古事业的一次壮举。它不仅为编写佛教经典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也是对我国石窟寺艺术的一次全面的整理和总结。同时,对于我国石窟寺的保护,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

先父生性忠耿正直,不畏权势,有强烈的爱国心。抗战胜利以后,先父应恩师金毓黻之聘赴沈阳,任沈阳博物馆主任、东北大学教授、《东北民报》主笔等职务,在东北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对于那些受国民党反动当局歧视和迫害的爱国知识分子,先父都给予深深的同情和慷慨的帮助。一九四七年春季,先父在《东北民报》上发表《端午感言》,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贪污腐败等罪行。后来,先父又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将其秘密转送到当时已经解放的大连市。全国解放前夕,先父毅然拒绝了海外高官厚禄的诱惑,愉快地接受了向达教授和汤用彤教授的聘请,飞回北京,任职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全国解放以后,先父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考古人才。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父和许多学者一样,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心一直不变。一九七二年,当他从“江西干校”返回北大校园时,我们问他对所受的迫害就没有一丝怨恨吗?先父感慨地说:“我是一个通晓历史的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要经历一个磨难的过程才能达到太平盛世。就像我当年坠入黄河,如果我不在惊涛骇浪中奋力拼搏,那就不能到达安全的彼岸。”先父这番话,至今依然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先父做了一辈子考古工作,在不少单位做过负责人,国家财产他锱铢不取。中国书店的著名古籍版本专家郭纪森老先生多次对我们讲:“我和你们父亲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我太了解他了,那真是两袖清风呀!”

一九七三年,先父不幸患颈椎增生症。一九七五夏季经过手术,先父的病基本痊愈,但右手失去了写字的能力。他丝毫未丧失继续执笔的信心,就在他六十五岁之际,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不到一年,先父左手写出来的字同右手写的一样工整有力。以后,先父就用左手坚持写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共出版了《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唐代贡举制度》、《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两京城坊考补》、《龙门石窟》等著作。

先父把他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的考古事业,他那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了考古事业中的一份宝贵的财富,他对考古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海人不倦的精神,正如北京大学考古系张辛教授的挽联所言:

石窟考古,交通中西,百卷著述昭史界;
泮宫滋兰,披沥光霁,一园桃李发寰中。

这副挽联概括地表述了先父在考古事业中取得的杰出成就。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在繁荣祖国文化事业的道路上前进。

云冈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其全部造像与龙门石窟相同,均系石雕,非似敦煌莫高窟俱为彩塑及壁画。余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曾调查全国各石窟,西起昆仑,东至东海,南游巴蜀,北上幽燕,遍览全国各石窟。尤以云冈、龙门,相去较近,故数次观览,拟详述其造像之由来,及其根据佛经而造出的佛本行、佛本生诸故事。

归来后,以二十余年之功力,除写出全国各地石窟之论文数十篇,略加考释外,并写出云冈石窟及敦煌莫高窟开窟年代及题材之论文,刊于各杂志,又写出全国数十处石窟之论文,交中国佛教协会资料室保管。

过去对云冈虽游览数次,多系浮光掠影,未加细致记录与研究。一九六五年春,为书写云冈石窟,特会集古建筑修整所杨烈及中国佛教协会刘明渊二同志,并由佛教协会聘请摄影学会老摄影师曹必慧先生等,成立云冈石窟考察团,考察云冈,时日较长。予以全力记录各窟室之造像,对窟中大像,俱详加测量,以备写报告时之用。至今思之,犹历历在目,五十余大窟,每窟之形制、大小,造像之复杂与否,俱熟烂于胸中。

一九七二年,余从“干校”返京,奉命归研究室撰书《云冈石窟研究》,并详究其各窟室之创造,俱按何佛经而造出之形象。

本书因系研究云冈石窟,整理材料及书写各窟之内容时,俱按造窟之时间,依次写出,全书共分七章。

首先叙述云冈名称之由来及开凿石室之历史。以下依次先叙昙曜开凿之五窟,并记出昙曜创造之风格。与五窟有一定距离之第一、二、七、八、九、十、十一、十三等窟(其中包括五华洞)为全窟群中较为复杂之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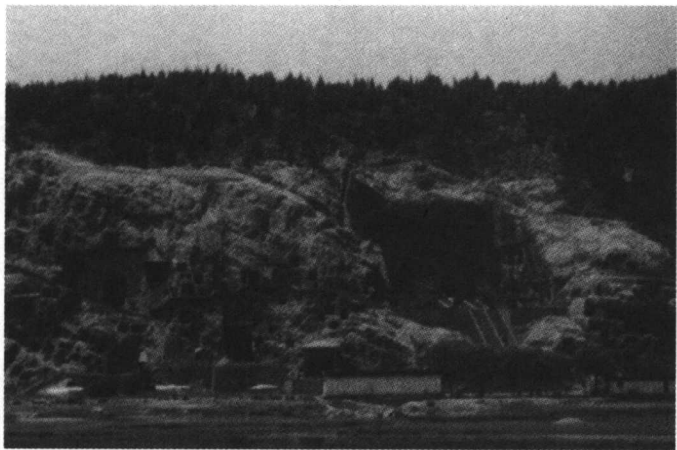


莫高窟

窟,时间约在太和十三年(489)改制以前。第五、六窟约在太和改革鲜卑归制,一切效法汉制之作风时而开凿者。第二十窟以后至五十三窟,约在迁洛以后至正光、孝昌时。第十一窟正面之二菩萨约在隋时创造,第五窟之大佛又系唐代重修。第三窟内后凿之一佛二菩萨,约当盛唐时期。第二十窟以后各窟,俱北魏国都迁洛以后所开凿者。此云冈石窟大略之情况也。此外,为使读《云冈石窟研究》者易于了解造像题材之内容,加写论述之文章数篇。为使读者易于了解云冈各期之风格与体例,特请中央民

族学院美术系陈兆复、邢琰二同志画出各期之造像近三十幅(更为使读者知各期之特点与作风之不同,又按年代先后拣出数十幅图片,这些图片由云冈文物保管所及北京图书馆阎万钧提供),使研究云冈者一目了然,由此上溯或下追历代之雕刻造像,或不无补益了。

更重要者为第一次重校勘者,为山西科学院刘淑珍同志。她于一九八七年几乎以一年时间详为校阅,不仅校阅而已,凡文字中不适当处,便细为阅读,同时加以改正,如此详尽代为修正全文,实非易事,附此深表谢忱。



龙门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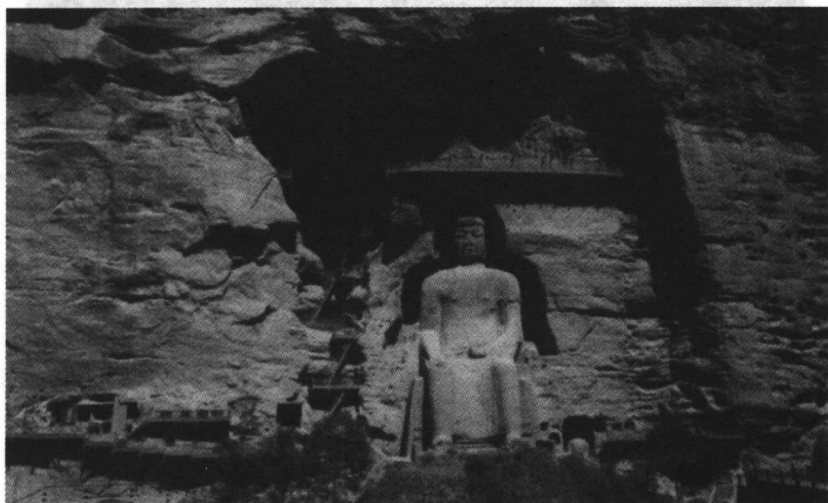
为研究全国石窟,余已写出《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又继续写出龙门石窟之记录与研究,已交中国佛教协会,尚不知何日刊行也。最后,用余清平调一阙,以记调查诸窟之过程。词云:

西起昆仑,览今古窟群;南下巴蜀通东海,停车小住飞来峰。莫高、炳灵行遍,麦积、宝顶踏乱;北上云冈、龙门,屈指行程三万。

一九八三年一月古稀老人述于北京大学真斋寓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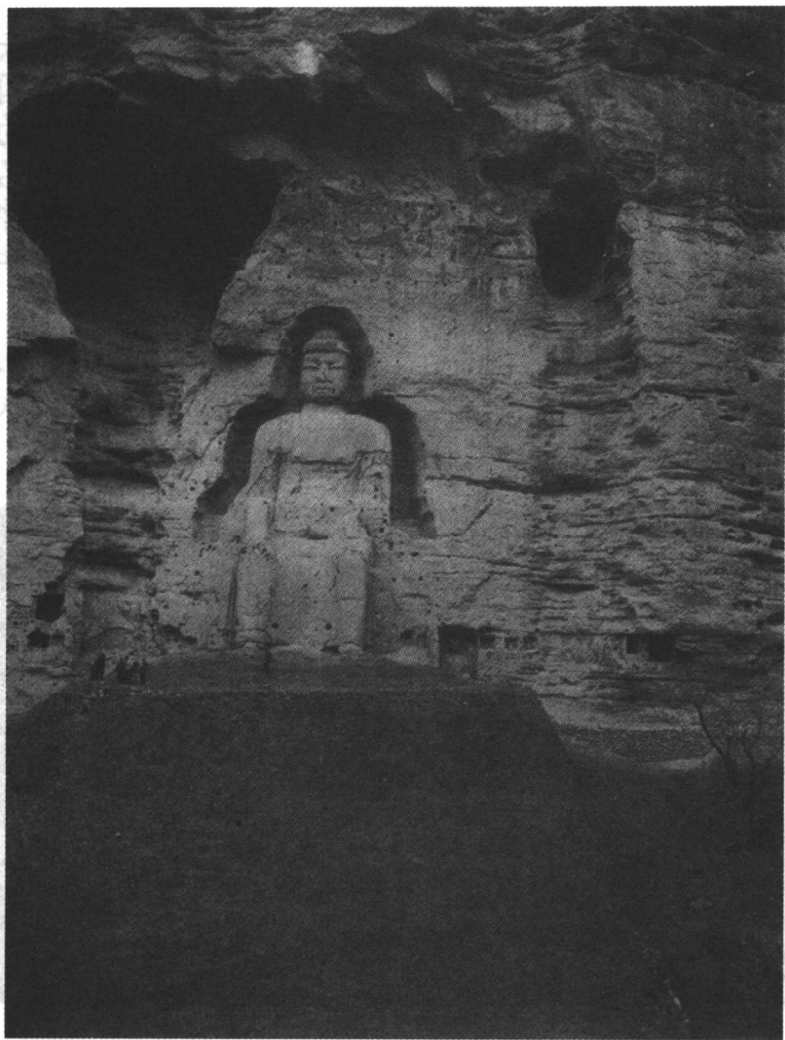
◆ 序 言	1
第一章 云冈的名称和开创的历史	1
第二章 云冈石窟第一期前段各窟造像的题材与特征	13
第三章 第一期后段造像题材与特征	45
第四章 云冈石窟第一期造像艺术的风格	131
第五章 云冈石窟第二期各窟造像的题材特征与风格	143
第六章 云冈石窟第三、四期造像的题材特征与风格	187
第七章 云冈石窟造像题材的总结	243
◆ ◆ 附 录	269
天夜叉、虚空夜叉与乾闥婆、紧那罗——兼释飞无名词之诂	271
罗睺罗因缘造像题材的商榷	285
密迹金刚力士与地夜叉	291
云冈第十八窟内遍身刻千佛的大像	305
云冈十寺	313
云冈石窟造像中一些题材的考释	317

中国玉门关以东,河西地带的石窟群,最早开凿而且保存较好的,当然是敦煌的莫高窟了。陇右地区较大的窟群,又有永靖的炳灵寺与天水的麦积崖。



炳灵寺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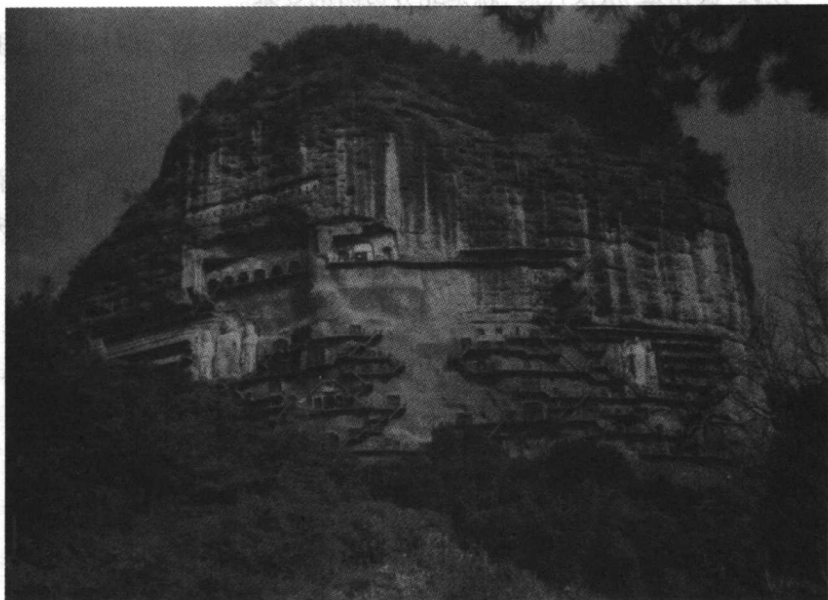
在十六国北朝之际,封建统治势力的中心是北魏的国都平城。根据《魏书·世祖纪》的记载,太武帝太延五年(439)灭北凉后,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平城。《魏书·释老志》中又说:从而有许多佛教沙门,都东到平城,于是佛教的信仰者就越发增多起来。这样,就不能不影响到佛教艺术的东



炳灵寺石窟全貌

流,进而开凿出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十六公里武州川峡谷的北岸、云冈堡的北山上。东西绵延约一公里,开凿有大小不同的各样窟龕。窟群之西,



麦积山石窟

上溯约三公里,河的北岸有吴官屯石窟。再西约十五公里高山镇附近、武州川的北岸,又有焦山石窟。如果连接起来,就绵延十余公里了。

一、云冈的名称

云冈其地,很早以前就见于文献记载,不过并不称作云冈,而称“武州塞”或“武周山”。因为武州川由西流来,经两山之间,东出山口,是古代汉与匈奴交界线上必经的道路。《史记·匈奴列传》(卷一百一十)中说:

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
奸兰,出物与匈奴交,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
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

所以“武州塞”从汉代起,就是北方边防的要塞。

北魏明元帝未即位以前,就到过武周山祈福。即位后,又每年到这里祭祀一次。《魏书·礼志》(卷一百〇八之一)中记:

太宗永兴三年(411)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初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性凶悍,帝每以义责之,弗从。帝惧其变,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及即位坛兆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

由于武周山是皇帝祈福的神山,因而开凿石窟时,就选择在这里。《魏书·释老志》中说:

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雄伟,冠于一世。

根据《魏书》的《显祖纪》与《高祖纪》的记载,显祖和高祖曾六次行幸武州山^①,其中四次专去武州山石窟,一次去祈雨,一次去武州山。(除此之外,还有一次是去北苑中的鹿野苑石窟^②,一次去方山石窟^③。)所以说武州山是拓跋氏统治集团的一个灵山。

酈道元《水经注》“漯水”条中也记:

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可见武州山石窟寺,是北魏皇室营建石窟的主要地点。不过以上这些文献都把这里称作武州山,就是到了辽、金的时候,也把这里叫作武州山石窟寺^④,而没有云冈的名称。

云冈这名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呢?根据各方面的记载,大概最早开始于明代。

在云冈石窟的石刻中,提到“云冈”之名,较早的有: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七月的《重修云冈堡记》。

顺治二年(1645)八月十五日的《重修云冈堡昊天庙碑记》。

顺治八年(1651)四月的《重修云冈大石佛阁碑记》。

康熙三十七年(1698)九月的《重修云冈寺记》。

在地方志中,顺治九年(1652)编纂的《云中郡志》卷一《疆域志》中的《云中郡总图》和《云中郡属图》内,郡城的西面,都有新云冈堡与旧云冈堡。雍正十一年(1733)编纂的《朔平府志》卷三“左云县石佛寺”条,又有“在县东九十里云冈堡”的记载。

这些文献可以说明“云冈”的名称,可能是从明代开始用的。

二、云冈石窟开创的历史

云冈开窟的年代,过去有两种说法:一是北魏明元帝神瑞年中(414~416),一是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前者文献的记载较晚,而后者的文献还要早一些。

神瑞年开凿的记载,出自唐人,西明寺僧所著《大唐内典录》卷四《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中说:

道武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出据朔州东三百里,筑城立邑,号为恒安之都,为符秦护军。坚败,后即真号。生知信佛,兴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谷东石碑见在,纪其功绩,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费赋,并成石窟,故其规模宏远,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

以后金皇统七年(1147)曹衍著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⑤,根据上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大加考证,云冈创建年代的结论是:

肇于神瑞，终乎正光，凡七帝，历百一十一年。

这块碑明代可能仍保存着，因而《永乐大典》引《析津志》收入了其碑文。其后，明成化时纂的《山西通志》卷五，清顺治九年编的《云中郡志》卷三、雍正十一年编的《朔平府志》卷三、乾隆四十七年编的《大同府志》卷五，又都可能根据金代曹衍的碑文，说是“始于神瑞，终于正光”。

上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的记载有年代上的错误：

一、把明元帝的神瑞元年，误为道武帝的纪年。道武帝拓跋珪建国后的年号为登国、皇始、天兴、天赐，共二十三年，并无神瑞年号。神瑞纪元是明元帝改的，元年是公元四百一十四年。

二、把神瑞元年相当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误为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太元元年为公元三百七十六年，神瑞元年距太元元年者三十八年。

这首先说明作者对北魏的纪年没弄清楚。对于恒安开窟事，也当然是不会清楚的。

再以《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的记事文章来看，所说拓跋珪改号神瑞元年，“出据朔州东三百里，筑城立邑，号为恒安之都，为符秦护军。坚败，后乃即真号”为一事（筑城立邑的事件也不是神瑞元年或登国元年，而是天兴元年^⑥），而“生知信佛，兴建大寺”为另一事。可惜金曹衍对这粗糙的文章，不但不加考核，而且又未细读，竟而说大谷石壁的开凿，是在神瑞元年，以致影响到明代以来的志书，都错误地说云冈石窟的开凿“始于神瑞，终于正光”。

和平初年开凿说的记载，见于《魏书·续高僧传》以及唐人各佛经的目录。《魏书·释老志》（卷一百一十四）中说：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雄伟，冠于一世。